

行业协会对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的作用机理研究

郑小勇

提要: 行业协会在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机理是通过其外部治理来影响集体行动影响因素与集群企业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集群企业的外生性集体行动受外生事件、外部反应、反抗意识、外部资源、组织水平及集体认同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意愿。同时, 行业协会对于其中的外生事件、外部反应、外部资源及组织水平因素中的动员强度一向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行业协会 集群企业 集体行动

一、引言

在纳达维(Nadvi, 1999)的研究中提到, 巴基斯坦医疗企业集群约有300 个家庭企业生产不锈钢医疗器械, 其中60%出口到美国。1994年, 美国认为其器械不符合要求而对其进口予以限制, 导致大批订单取消, 工厂停产, 工人失业。此后, 医疗器械生产商联合会组织企业采取联合行动, 通过合作努力, 到1997年企业集群基本渡过了危机。又例, 2002年温州打火机企业遭遇欧盟CR(Children Resistance Law)^① 法案, 要求进口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设有防止儿童开启装置(即安全锁)。温州打火机的外贸出厂价基本在1欧元左右, 且欧盟市场占其国际市场70%的份额, 不能轻言放弃。最后在温州烟具协会的组织下, 温州打火机企业对CR法案进行了集体抗辩。

以上案例说明, 集群发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来自集群外部的压力, 这些压力会影响集群的利益, 影响集群企业的利益。当集群面临外生事件的压力时, 仅凭集群内单个企业的力量无法改变或应对, 而是要通

^① CR法案即《儿童保护法》。该法案规定: 凡向欧盟市场出口的一次性打火机必须加装防止儿童开启装置以防意外。此外, 所有新奇打火机, 包括加装了防止儿童开启装置的新奇打火机将不得投放欧盟市场。2007年3月11日起欧盟CR法案正式实施。

过集群企业的通力合作、相互支持才能消除或缓解。这时如何协调集群企业的统一行动,维护集群及集群企业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多案例观察发现,在这些集体行动中,行业协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集体行动的类型学者们的看法不一,其类型也较多,难以从一个统一的角度看待行业协会对集体行动的作用,因此,本文只研究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一种具体的类型,笔者称之为外生性集体行动。事实上这种外生性集体行动也是目前我国集群企业最为频繁的一种集体行动类型。对该类型集体行动的研究影响面广,意义较大。

目前,总体上对企业集体行动的理论性探索不是很多,国内仅有的少数涉及企业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关注相对较多的是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的集体行动(李红春,2005;张亦宁,2006)及集体行动的困境(陈潭,2003)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企业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企业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企业集体行动的引导、激发与抑制,等等。相对而言,行业协会的研究基础较厚,但把行业协会(特别是集群中的行业协会)与(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相结合的研究只是在近几年才有所增加。已有的实例及理论性探索已经显示了行业协会在企业集体行动中的积极作用(黄少卿、余晖,2005)。对于集群而言,协调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是行业协会功能优势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骆璇、符正平,2007),也因此,各个行业的企业都在企图通过行业协会以相互合作的方式寻求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并获得竞争优势(Kingsbury & Hayter, 2006)。不过,对行业协会与集体行动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还欠深入。因此,有关行业协会的集体行动机理研究对于充分发挥集群中的行业协会在集群治理中的作用有参考意义^①,一方面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丰富了集体行动理论。

本文试图通过深入挖掘行业协会在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机理,对行业协会的集体行动机理做尝试性的探索。笔者期待这些研究对于行业协会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协会对于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的引导、激发或抑制具有启发意义。

^① 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是集群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彼德·戴·兰吉恩(De Langen, 2004)的研究就把集群企业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作为影响集群治理绩效的四个变量之一。集群中的行业协会在集群企业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体现了行业协会的集群治理功能。

二、关于行业协会及外生性集体行动的概念界定

(一)对行业协会的概念界定

不同国家或不同学者对行业协会的理解不同。综观现有对行业协会的理解,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要素来审视的:(1)行业协会的性质;(2)行业协会的目的;(3)行业协会的成员;(4)行业协会的生成途径。本文比较主流的观点及研究学者进行了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行业协会概念界定的四个要素

要素	描述	研究者
行业协会的性质	非盈利性组织	拉姆和薛尔兹(Lamb & Shields, 1971)、美国协会执行官组织、宋养琰(1995)、陈金罗(1997)、吴宗祥(2003)、贾西津等(2004)、杨穿明(2006)
行业协会的目的	使企业有效运作,提高行业的地位	拉姆和薛尔兹(1971)
	维护共同利益,达到共同目标	布拉德利(Bradley, 1965)、美国《经济学百科全书》、张亮(2004)、英国的权威人士(张理泉, 1991)、余晖等(2002)、吴宗祥(2003)
行业协会的成员	参与者是否是组织身份,是否有竞争性	布拉德利(1965)强调组织身份;拉姆和薛尔兹(1971)用竞争者模糊指代,强调参与者竞争性
行业协会的生成途径	在自愿基础上形成	张理泉(1991)、宋养琰(1995)、陈金(1997)、余晖等(2002)、贾西津等(2004)、杨穿明(2006)

从我国现有的行业协会来看,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谋取自身利益,尽管它提供的服务有些是有偿的,但这些收入是补偿性的,主要用于维持机构运行。所以,笔者也赞成把行业协会的性质定为非盈利性组织。行业协会的参与者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个人,所以没必要在界定时有意识地强调组织身份或是个体身份。这些参与者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如鞋革协会、紧固件协会、律师协会和会计师协会等,参与者身份不同但都处同一行业,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的竞争关系。这些事业者参加行业协会的目的会因组织或个体在行业中的地位不同而有所不同。以企业为例,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能会较多地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比较顾及行业的整体利益。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参加行业协会的目的则更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管是行业的共同利益还是个体的自身利益,其最终归属仍是组织或个体的自身利益。所以,参与者的目的可以

认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后,从生成途径上看,尽管有些国家的某些行业协会是强制入会的,但各国的大部分行业协会均采取会员制,即行业成员自愿申请入会,同时会员也有退会的权力。故行业协会的建立、运作和发展体现的是成员的自愿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行业协会的定义可以表述为:同一行业内的组织或个体为了自身利益而自愿参与并组织起来的非盈利性机构。

(二) 对外生性集体行动的概念界定

蒂莉(Tilly et al., 1975)在区分集体行动的形式时把集体行动划分为“竞争型”、“反应型”和“先发型”三种类型。其中“反应型”集体行动指发生于受到威胁的群体反抗另一个群体(比如公共官员)要占有它的资源时的行动。受到威胁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集体行动是受到群体外部的侵犯而引发的,群体外部的这种侵犯性事件或行为是导致集体行动的前提。本文所指的外生性集体行动类似于蒂莉的“反应型”集体行动。概括地说,外生性集体行动是指由于集群外部所发生的事件或行为影响了集群利益而产生的集群企业集体行动,导致这种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事件或行为概称为外生性事件。这种外生性的集体行动通常有以下特点:(1)集体行动诱因的外在性,即行动的直接诱发因素来自组织或群体之外具体事件的刺激,后者改变了其所处的外在环境(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使其处于不利状态;(2)集体行动的目的性,即行动的目的在于维护和维持群体内成员原有的利益平衡,消除外在压力所引起的失衡;(3)集体行动的暂时性,此类集体行动是由外部事件引发,只要外在的压力消失,集体行动也就结束;(4)集体行动手段的极端性,此类集体行动一般不会采取温和的方式进行,而是以集体诉讼、集体抗辩或集体罢工等方式。有关外生性集体行动的理解和界定对于本文及后续的研究很重要。

三、行业协会在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模型

(一) 模型的总体构思

许淑君、马士华(2001)提出行业性的协会与商会组织作为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形式,对企业间的合作关系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协

会和商会可以加强企业间的融合,协调企业关系,为企业间的交流起桥梁和纽带作用(徐国念、宫建成,2001);也可以约束企业合作中的行为,对于企业的背叛行为给予全行业、全地区的制裁等。企业集体行动作为企业合作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同样会受协会或商会这种作用的影响。余晖等人(2002)和郑江淮(2006)更进一步指出,集体行动必须由协会组织出面协调和组织才会有好的效果。集体行动会产生很多费用,成本会相当高,单个企业难以承受,这就需要协会出面组织协调,由有关企业分摊费用,解决企业的搭便车问题。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来看,行业协会的存在影响了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影响企业的社会关系等,从而影响企业之间的合作,甚至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看,行业协会的存在使得“赏罚”的有效性更能得到认同或体现,而这种有效的激励或惩罚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对于集体行动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协会组织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这种有效性从而影响集体行动。

企业间的社会关系,企业群体的赏罚机制及有效性等是影响企业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而行业协会实际上是在集体行动各影响因素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上起着影响作用。基于对变量的理解,如果变量 Y 与变量 X 的关系是变量 M 的函数,则称 M 为调节变量(James & Brett, 1984)。就是说, Y 与 X 的关系受到第三个变量 M 的影响,这种有调节变量的模型一般可以用图1示意。调节变量可以是定性的(如性别、种族、类型等),也可以是定量的(如年龄、受教育年限、次数等),它影响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正或负)和强弱程度(Baron & Kenny,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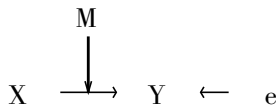


图1 调节变量示意图

所以,对于行业协会在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机制可以这样来描述:当在集群外部发生一些影响集群企业利益的事件或行为(简称为外生事件)时,集群企业是否会因此组织起来为了同一目标

而统一行动(集体行动)——除了受外生事件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外部资源可获性和社会网络等。而在这些因素影响集群企业决策的过程中,行业协会起到了调节作用,由于行业协会的存在和作用的发挥会在某种程度上放大或缩小这些影响因素对集群企业的影响程度,从而影响集群企业集体行动决策,这一作用过程可以用图2来描述。



图2 行业协会作用机理模型

(二) 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提出

外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提出及指标设计的基本逻辑是:在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进行梳理,然后根据文献资料(集体行动的驱动力理论)及访谈结果设计各个因素的考察指标。

在提出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之前,需要两点说明或曰两个假设前提。第一,外生性集体行动是集体行动的类型之一,因此可以借鉴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和思路。第二,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与社会学研究的民众的集体行动有共性。集群企业相对于集群来说是其中的个体,正如个人在群体中的角色一样。集群企业的决策最终由企业中的人做出,特别是在企业中拥有较大决策权的一个或若干个人,因此,他们在决策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时表现出相似性。所以可以认为,社会学家在研究民众参与集体行动时得出的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结论同样适用于研究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

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主要是在迈克亚当(McAdam, 1982)的“四因素论”基础上提出的。“四因素”指的是政治机会、抗议意识、组织水平及其他社会群体对抗议的反应。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其他影响因素,讨论较多的是外部资源(Jenkins & Perrow, 1977)、社会网络(Klandermans, 1997)及集体认同感(Snow et al., 1986)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作用。其中科莱德曼强调的社会网络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实际上是说明个体总是处在一个群体当中,个体的决策总会受到相关群体

的影响,这与迈克亚当的其他群体对抗议的反应因素有诸多相似之处,进而可以把科莱德曼所指的社会网络与迈克亚当所指的其他群体的反应两者合成外部反应因素。在本文中,调研的对象是集群中的个体企业,相对于个体企业而言,本集群内其他企业的反应或本集群外的其他集群及集群企业的反应均可称之为“外部”。迈克亚当所说的政治机会实际上指可利用的政治机会,可以理解为来自于政府的支持,因此,本文将其分解到外部资源这一因素的各个指标中去,即文中所提的外部资源中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来自政府的资源。最后,作为外生性的集体行动,外生性事件包括外生事件的属性及传播等对于集群企业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有影响作用。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影响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的因素集,即外生事件、外部反应、反抗意识、外部资源、组织水平、集体认同6个方面。在每个因素具体指标的设计时参考的理论依据包括利益集团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及社会资本理论,梳理出的指标通过试访的形式进行试验,最终确定外生事件的4个指标,即强迫性大小、影响强度、影响广度、事件传播;外部反应指标;反抗意识的2个指标,即不公平性及可消除性;外部资源的3个指标,即经费支持、信息支持及舆论支持;组织水平的3个指标,即对组织者的信任、动员幅度及对赏罚的认可;集体认同的3个指标,即相互依存、同质程度、自我约束等16个指标(郑小勇,2007)。有关指标的说明可进一步参考相关文献,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这样图2的模型就进一步演化为图3,并可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集群企业充分认识外生事件的压迫性、外生事件的影响程度及影响广度会增强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

假设H2:集群企业的参与意愿会受其他企业或其他团体对于类似事件的反应态度的影响,外部的肯定反应会增强其行动意愿。

假设H3:集群企业的反抗意识的强弱影响其参与行动的意愿,即反抗意识越强,在外生事件发生之后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会越强。

假设H4:来自外界的资源,如经济上、信息上和舆论上的支持,会影响到集群企业的行动意愿。

假设H5:集群企业的参与行动意愿受集体行动的组织水平的影响,即组织水平高,集群企业参与行动的意愿就强。

假设H6:集群企业对其所在的集群或利益团体的认同感会影响其行动意愿,集体认同感强的情况下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也就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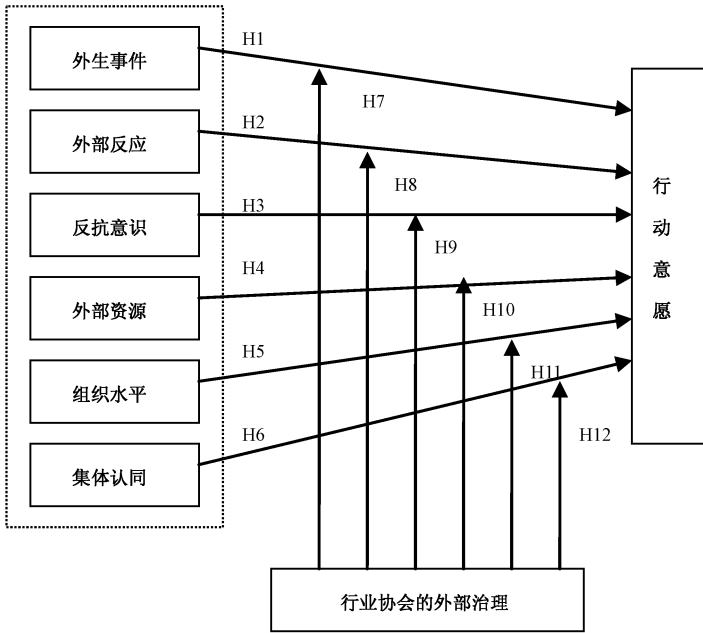


图 3 行业协会作用机理模型 II

假设 H7: 行业协会的外部治理是影响外生事件因素和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意愿的调节变量, 对其影响过程起调节作用。

假设 H8: 行业协会的外部治理是影响外部反应因素和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意愿的调节变量, 对其影响过程起调节作用。

假设 H9: 行业协会的外部治理是影响反抗意识因素和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意愿的调节变量, 对其影响过程起调节作用。

假设 H10: 行业协会的外部治理是影响外部资源因素和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意愿的调节变量, 对其影响过程起调节作用。

假设 H11: 行业协会的外部治理是影响组织水平因素和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意愿的调节变量, 对其影响过程起调节作用。

假设 H12: 行业协会的外部治理是影响集体认同感因素和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意愿的调节变量, 对其影响过程起调节作用。

(三) 对集体行动测量的说明

对于集体行动的测量, 如果直接用行动的发生与否来测量, 每个集

群企业的测量结果就只有“是”和“否”两种可能,从而使集体行动的测量成了逻辑变量。这样很难判断集群企业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的强烈程度,或者说这种集体行动决策的稳定程度有多高。而合作意愿的强烈程度是影响合作行为稳定性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李瑞涵、赵强,2002)。合作意愿越强,合作行为的稳定性就越强。应用到集体行动中,也就是行动意愿(参与意愿)越强,集体行动的稳定性和强度就越强。同时,应用行动意愿来测量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通过行动意愿的强烈程度来观察这些影响因素对于集群企业的影响程度。

之所以选择用参与意愿或称合作意愿作为测量指标,是在参考国内学者对个体参与行动或合作的可能性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事实上,这种测量方法已有不少学者使用过,郭东红、蒋文华(2004)在《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一文中为了观察影响因素对农民合作行为的影响程度使用了行为意愿这样的指标。陈希敏(2006)在金融界争论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究竟应当坚持合作制还是股份制的背景下,也应用“合作意愿”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户金融合作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除此之外,许多学者研究个体的合作行为或个体参与行为时均以合作意愿或参与意愿作为测量指标(曹建民等,2005;黎东升等,2006)。用合作意愿进行测量所隐含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合作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合作行为,并且合作意愿越强合作可能性越大。

对于参与意愿的测量方法,学者们也有不同的做法。曹建民等(2005)在研究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时,以举手赞成的百分率来判定参与意愿的强弱。黎东升等(2006)研究农民参与再就业素质培训的意愿时,把参与意愿的含义界定为农民是否愿意参与再就业素质培训,结果包括“愿意”和“不愿意”,相当于用0和1两个变量来进行测量。本文则在后者的基础上将意愿根据强弱分成5个等级进行测量分析。

四、实证研究

(一) 调研对象、问卷设计及统计方法说明

实证部分的目的是在访谈调研的基础上,对影响集群企业参与集

体行动的因素进行深入的统计分析,同时也用实际数据来观察集群内的行业协会在各影响因素影响集群企业集体行动意愿的过程中是否起到一定的作用。研究对象限于集群内的企业,施测范围包括温州打火机集群、温州鞋业集群、慈溪小家电集群、绍兴纺织集群及义乌玩具产业集群等,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07份,其中有效问卷193份。被试企业的基本情况见表2,被试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3。

表2 企业基本信息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入会情况	会员		94	48.7
	非会员		99	51.3
企业性质	民营	会员	68	35.23
		非会员	72	37.31
	股份	会员	9	4.66
		非会员	12	6.22
	外资	会员	3	1.55
		非会员	6	3.11
	合资	会员	14	7.25
		非会员	9	4.66

表3 填表人的有关背景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学历	专科以下	46	23.83
	专科	103	53.37
	本科	42	21.76
	硕士	2	1.04
工作时间	3年以下	64	33.16
	3年及以上	131	67.88
管理工作时间	3年以下	52	26.94
	3年及以上	143	74.09

问卷主体总体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企业和填表人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针对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设计的问题,该部分由三块内容组成:一是影响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的因素;二是有关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主要了解企业在参与集体行动前的意愿强烈程度;三是行业协会的信息,主要是用于观察行业协会与影响因素及行动意愿之间的关系。

问卷主体部分采用“李克特多选项量表”(Likert Scale),按五点正向记分。问卷回收后,对采集的数据用 SPSS13.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包括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等。

(二) 因子分析

对于回收的问卷,笔者首先对所有变量的相关矩阵进行检验。采用的方法是 SPSS 13.0 所提供的 KMO 样本测度法(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法(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计算结果显示样本 KMO 值为 0.786,大于 0.7;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 χ^2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小于 0.001(见表 4)。综合 KMO 值和 χ^2 说明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4 影响因素的 KMO 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结果

KMO 样本测度		.786
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近似卡方值	771.667
	自由度	120
	显著性概率	.000

根据调查问卷的得分,运用 SPSS 13.0 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在 Descriptives 中选择各变量描述统计量(Univariate descriptives),Extraction 中选择主成分法(Principal components),因子提取原则为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采用“方差最大”旋转(Varimax),最大收敛迭代次数为 25,Score 项选择回归法(Regression),得出了一阶因子分析载荷矩阵,如表 5 所示。根据因子载荷矩阵表,6 个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达到 65.44%。因此,6 个因子对底层指标综合反映效果良好,且所得各因子载荷系数呈现一定的集中化倾向,这为本文给各因子包含的信息进行命名奠定了基础。

因子分析还通过了内部一致信度检验。根据 SPSS 13.0 的运算结果,本文还计算出了克劳伯克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系数(Cronbach α)。从表 5 可知,6 个因子指标的 α 系数均达到了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笔者也注意到,在 F1 因子中,相互依存度这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很低,根据项目在公因子上的负荷大于或等于 0.4 为入选因子矩阵的标准,该项目不应该入选,因此再做因子分析如表 6。

表 5 影响因素旋转后的因子负载矩阵

	指标	F1	F2	F3	F4	F5	F6
F1	强迫性大小	. 756	. 221	. 040	. 044	. 130	. 098
	影响广度	. 802	. 167	. 062	-. 083	. 059	. 745
	信息支持	. 632	. 103	-. 020	. 502	-. 032	. 579
	集群企业相互依存度	. 203	. 090	. 169	. 051	. 073	. 140
F2	外部反应	. 149	. 790	. 081	. 059	. 167	. 632
	认识到外生事件的不公平性	. 465	. 561	. 233	. 128	-. 110	. 149
	认识到反抗行为可以消除不公平	. 199	. 761	. 224	-. 047	. 079	. 465
	集群企业自我约束力	. 072	. 503	-. 101	. 114	-. 157	. 199
F3	动员的强度	. 146	. 233	. 653	. 185	. 239	. 072
	集群企业同质性程度	. 039	. 055	. 819	-. 038	-. 171	. 146
F4	经费支持	-. 282	. 409	-. 146	. 542	. 323	. 039
	舆论支持	. 197	. 009	. 190	. 820	-. 005	-. 282
F5	对组织者的信任	. 110	-. 045	-. 052	. 098	. 679	. 197
	对赏罚有效性的认可	. 140	. 092	. 099	-. 020	. 735	. 110
F6	影响强度	. 745	. 110	. 076	. 079	. 110	. 756
	事件传播	. 579	. 022	. 426	. 158	. 162	. 802
解释力	特征值	3. 022	2. 115	1. 510	1. 343	1. 329	1. 173
	方差贡献率	18. 764	13. 217	9. 435	8. 387	8. 303	7. 332
	累计贡献率	18. 764	31. 981	41. 417	49. 804	58. 107	65. 440
	α 系数	. 674	. 689	. 498	. 351	. 332	. 515

从因子分析的结果看, F1 因子除了包含外生事件因素之外, 还把外界资源的信息支持项归入了该因子, 经分析发现信息支持对于事件的传播, 对于集群企业认识外生事件、感受外生事件的压迫性、了解外生事件的影响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这个因子仍命名为“外生事件”。F2 因子中除了原来的反抗意识因素外, 还把外部反应和自我约束力两项归入进来,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个体的反抗意识强弱受与其相关群体的反应的影响较大, 相关群体的反应将直接影响个体的反应, 而自我约束力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对不公平性的认识, 所以这个因子仍命名为“反抗意识”。而 F3 因子则反映的是集群企业的关联性, 在此命名为“集体认同”。F4 和 F5 这两个因子与原设想相比均少了一个指标, 其他两个指标没变, 为此, 分别命名为“外部资源”和“组织水平”。因子分析的因子构成与前文根据理论认识和经验访谈提出的 6 个影响因素及其构成指标有所不同, 这不足为怪, 因为在理论部分, 对于因素的归纳角度与实证分析中数据的内在规律性不一定完全重合。

表 6 影响因素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指标	F1	F2	F3	F4	F5
F1	强迫性大小	.755	.229	.039	.045	.147
	影响强度	.745	.129	.079	.078	.129
	影响广度	.806	.188	.071	-.086	.078
	事件传播	.587	-.023	.357	.210	.145
	信息支持	.619	.095	-.068	.526	-.034
F2	外部反应	.149	.782	.077	.063	.177
	认识到外生事件的不公平性	.469	.551	.216	.148	-.101
	认识到反抗行为可以消除不公平	.207	.740	.207	-.027	.082
	集群企业自我约束力	.064	.542	-.023	.053	-.100
F3	动员强度	.159	.205	.660	.189	.263
	集群企业同质性程度	.065	.074	.857	-.042	-.141
F4	经费支持	-.298	.424	-.136	.520	.338
	舆论支持	.186	.027	.174	.823	.008
F5	对组织者的信任	.104	-.020	-.001	.044	.719
	对赏罚有效性的认可	.143	.049	.045	.010	.712
解释力	特征值	2.976	2.101	1.463	1.353	1.352
	方差贡献率	19.839	14.004	9.750	9.018	9.014
	累计贡献率	19.839	33.843	43.594	52.612	61.626
	α 系数	.801	.689	.498	.351	.332

根据 SPSS 13.0 的运算结果,重新计算出 α 系数。从表 6 可知,重测的 5 个因子指标的 α 系数均达到了可以接受的程度。在分析出这 5 个因子后,进一步利用 SPSS 求出各自的因子值,之后的相关与回归分析便可以利用这 5 个因子值变量代替初始变量指标。

(三) 相关分析

1. 各因素与集体行动意愿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讨各因素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本文对所有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相关关系是指两类现象在发展变化的方向与大小方面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能确定这两类现象之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本部分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

从影响因子来看,所有的 5 个因子均在 0.01 的水平上与企业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有显著相关关系,其中相关系数相对较高的是外生事件及反抗意识两因素,为了进一步观察各个具体指标与行动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做了具体指标与行动意愿的相关分析。

表 7 影响因素因子与集体行动意愿相关分析

	F1	F2	F3	F4	F5
集体行动意愿	.446 **	.363 **	.206 **	.243 **	.277 **

说明: 本文涉及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在 .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1 水平上显著相关。以下同。

从表 8 的结果看, 各个影响因素指标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显著性均在 0.01 的水平上。结合表 7、表 8 的结果可知, 外生事件因子的各项指标与集体行动意愿的相关性很高, 反抗意识因子的外部反应、不公平性和可消除性相对更密切。此外, 外部资源因子中的信息支持, 集体认同因子中的相互依存及动员强度与行动意愿的相关性程度高。

表 8 影响因素指标与集体行动意愿相关分析

	强迫性大小	影响强度	影响广度	事件传播	外部反应	不公平性
行动意愿	.439 **	.469 **	.438 **	.386 **	.351 **	.465 **
	可消除性	经费支持	信息支持	舆论支持	对组织者的信任	动员强度
行动意愿	.440 **	.245 **	.510 **	.266 **	.324 **	.373 **
	对赏罚的认可	相互依存	同质程度	自我约束		
行动意愿	.267 **	.403 **	.249 **	.270 **		

2. 各影响因素与行业协会的相关分析

表 9 显示, 强迫性大小、影响广度、外部反应、不公平性、可消除性、舆论支持、动员强度和相互依存等 8 个指标与行业协会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功能均显著相关, 显著水平均在 0.01 上。影响强度、事件传播和信息支持等 3 个指标均在 0.01 水平上与行业协会的信息沟通显著相关, 而在 0.05 水平上与行业协会的协调功能显著相关。此外, 经费支持、对组织者的信任、同质程度和对赏罚有效性的认可等 4 个指标只与行业协会的协调功能显著相关, 前三者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后者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 9 影响因素与行业协会相关分析

	强迫性 大小	影响 强度	影响 广度	事件 传播	外部 反应	不公 平性
信息沟通 协调功能	.414 **	.474 **	.463 **	.470 **	.333 **	.543 **
	.210 **	.170 *	.197 **	.166 *	.263 **	.342 **
	可消 除性	经费 支持	信息 支持	舆论 支持	对组织者 的信任	动员 强度
信息沟通 协调功能	.418 **		.553 **	.235 **		.194 **
	.345 **	.225 **	.167 *	.352 **	.227 **	.317 **
	对赏罚 的认可	相互 依存	同质 程度	自我 约束		
信息沟通 协调功能		.276 **		.164 *		
	.157 *	.353 **	.333 **	.396 **		

3. 行动意愿与行业协会的相关分析

行业协会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功能均与集体行动意愿存在着相关关系,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说明行业协会两块功能的发挥都会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强弱起重要的作用(见表 10)。

表 10 行业协会与行动意愿相关分析

	信息沟通	协调功能
集体行动意愿	.552 **	.428 **

(四)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可以说明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关系的紧密度与方向,回归分析则可进一步指明关系的方向,可以说明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部分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对构思图的前后因果关系进行验证。考虑到指标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Stepwise),逐步剔除不重要的解释变量,消除共线性问题。

从表 11 看出,5 个因子全部进入了回归模型,首先进入的是 F1 和 F2 这 2 个因子,然后是 F5、F4 和 F3 这 3 个因子依次进入。根据前文在因子分析中的结果可知,这些因子能较好地代表它们的底层指标,说明 5 个因子代表的所有底层指标对于解释集群企业的行动意愿都有帮助。由输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解释了总体变异的 53.4%(调整后的决定系数 R Square)。F 检验值为 37.643 **,从回归的效果看,达

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整个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各项 t 检验均小于 0.01, 表明各项数据与 0 有显著差异, 均应出现在回归方程中。

表 11 影响因素对集体行动意愿的逐步回归分析

因素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值	显著性水平 Sig.	决定系数
	B	标准误差				
常数项	3.596	.033		110.022	.000	R square=.548 校正后的决定系数 R square=.534 F 值: 38.733
F1	.285	.033	.446	8.697	.000	
F2	.232	.033	.363	7.080	.000	
F5	.177	.033	.277	5.409	.000	
F4	.155	.033	.243	4.737	.000	
F3	.132	.033	.206	4.025	.000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标准的回归方程:

$$\text{集体行动意愿} = 3.596 + 0.446 \times F1 + 0.363 \times F2 + 0.277 \times F5 + 0.243 \times F4 + 0.206 \times F3$$

得出这个方程的意义, 一方面进一步明示了各个影响因子与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关系和影响程度; 另一方面其作用还在于可以借此来对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意愿做出预测分析。

(五) 方差分析

本文旨在观察集群里的行业协会在影响因素影响集群企业集体行动时, 对于这一影响过程的作用, 行业协会对于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企业是区别对待的, 为此与前文一样, 仍然分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企业来观察两者在参与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中是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表 12 是对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企业的均值及均值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的结果。

从比较的结果看, 外生事件、外部反应和外部资源等 3 个因素存在着显著差异, 其中外部事件和外部反应 2 个因素均在 0.01 的水平上有显著差异性, 而外部资源因素在 0.05 水平上有显著差异性。这也进一步说明, 在一个集群中, 各种影响因素在影响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意愿上所起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为此, 把集群企业分成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企业分别分析是有必要的。至此, 可以认为行业协会在影响因素作用于集群企业集体行动意愿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但不是对所有的因素都起作用, 只是对其中的 3 个变量影响较为显著,

从而验证了假设 6、假设 7 和假设 9^①。为进一步观察各个具体指标的差异性, 将做进一步的方差分析。

表 12 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企业影响因素的均值比较结果

	外生事件	外部反应	反抗意识	外部资源	组织水平	集体认同
会员	3.4441	3.1596	3.5904	3.5035	3.4397	3.5390
非会员	3.0581	3.5051	3.5404	3.6902	3.5387	3.6498
总体	3.2461	3.3368	3.5648	3.5993	3.4905	3.5959
F	18.582	11.528	.254	6.253	1.679	2.539
Sig	.000	.001	.615	.013	.197	.113

表 13 影响因素指标均值比较结果

	强迫性大小	影响强度	影响广度	事件传播	外部反应	不公平性
平均值	3.1277	3.6915	3.5532	3.4043	3.1596	3.6702
标准差	.83259	.82991	.86282	.90778	.76627	.79499
平均值	2.7879	3.5354	3.2121	2.6970	3.5051	3.4646
标准差	.70382	.71875	.79889	.82628	.64482	.97220
	可消除性	经费支持	信息支持	舆论支持	对组织者的信任	动员强度
平均值	3.5106	3.0426	3.7979	3.6702	3.4468	3.2234
标准差	.74408	.74653	.71210	.75332	.78449	.86949
平均值	3.6162	3.8081	3.4545	3.8081	3.5253	3.5455
标准差	.66558	.64960	.70382	.76501	.87299	.82404
	对赏罚的认可	相互依存	同质程度	自我约束	行动意愿	信息沟通
平均值	3.6489	3.4574	3.6277	3.5319	3.6064	3.5851
标准差	.71403	.68258	.74753	.66724	.60851	.57566
平均值	3.5455	3.6364	3.6162	3.6970	3.5859	3.2929
标准差	.71817	.67695	.79163	.77531	.67021	.53932
	协调作用					
平均值	3.5106					
标准差	.56311					
平均值	3.6768					
标准差	.58603					

注: 黑体部分为会员企业数据。

① 清华大学的张勉、张德在研究 Price-Miller 离职模型中价值观的调节作用时也是采用这种方法验证, 此外如暨南大学的卢馨、顾建平(2004)在《知识员工薪酬激励调节变量》一文中也是通过类似的方法进行的验证。

表 14 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企业方差比较分析

	方差		自由度	方差均值	F 值	显著性系数
	组间	组内				
强迫性大小	组间	5.567	1	5.567	9.408	.002 **
	组内	113.014	191	.592		
	总量	118.580	192			
影响强度	组间	1.175	1	1.175	1.958	.163
	组内	114.679	191	.600		
	总量	115.855	192			
影响广度	组间	5.609	1	5.609	8.130	.005 **
	组内	131.779	191	.690		
	总量	137.389	192			
事件传播	组间	24.121	1	24.121	32.095	.000 **
	组内	143.547	191	.752		
	总量	167.668	192			
外部反应	组间	5.755	1	5.755	11.528	.001 **
	组内	95.354	191	.499		
	总量	101.109	192			
不公平性	组间	2.038	1	2.038	2.570	.111
	组内	151.403	191	.793		
	总量	153.440	192			
可消除性	组间	.537	1	.537	1.081	.300
	组内	94.904	191	.497		
	总量	95.440	192			
经费支持	组间	28.257	1	28.257	57.919	.000 **
	组内	93.183	191	.488		
	总量	121.440	192			
信息支持	组间	5.684	1	5.684	11.343	.001 **
	组内	95.705	191	.501		
	总量	101.389	192			
舆论支持	组间	.917	1	.917	1.589	.209
	组内	110.130	191	.577		
	总量	111.047	192			
对组织者的信任	组间	.297	1	.297	.430	.513
	组内	131.921	191	.691		
	总量	132.218	192			
动员强度	组间	5.001	1	5.001	6.980	.009 **
	组内	136.854	191	.717		
	总量	141.855	192			
对赏罚的认可	组间	.516	1	.516	1.007	.317
	组内	97.960	191	.513		
	总量	98.477	192			

续表 14

	方差		自由度	方差均值	F 值	显著性系数
相互依存	组间	1.544	1	1.544	3.341	.069
	组内	88.239	191	.462		
	总量	89.782	192			
同质程度	组间	.006	1	.006	.011	.918
	组内	113.382	191	.594		
	总量	113.389	192			
自我约束	组间	1.314	1	1.314	2.501	.115
	组内	100.313	191	.525		
	总量	101.627	192			

表 12 显示出外生事件、外部反应和外部资源三个因素上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企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通过表 13 和表 14 显示的结果可以更具具体地看出, 外生事件的强迫性大小、影响广度和事件传播 3 个指标均在 0.01 的水平上表现出差异性。外部资源因素中主要是经费支持和信息支持两个指标表现出差异性, 尤其是经费支持指标, 是所有指标中差异性最大的一个, 说明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企业集体行动意愿的强弱受经费支持这个指标影响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 具体而言, 即外界经费支持对会员企业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小, 而对非会员企业的集体行动的意愿影响大, 在相关分析的部分对此已做说明。另外, 通过具体指标的方差分析, 意外地发现了动员强度在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之间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通过比较其他实证部分的结果, 会员企业的动员主要与协会的信息支持有关, 而非会员企业的动员则主要看重的是协会的协调功能。

(六) 模型的修正及说明

通过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对作用机理模型 II 及其相应的假设进行了验证, 发现假设 1—9 得到了实证支持, 而假设 10—12 没有得到相应的数据支持。所以, 在此结论部分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对原有的理论模型做了一定的修正, 如图 4 所示。

模型 II 中的假设 10—12 没有得到数据支持, 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业协会在其他三个因素影响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过程中没有作用, 从文中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 行业协会与这些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只是对于会员企业和非会员企业而言, 这种区分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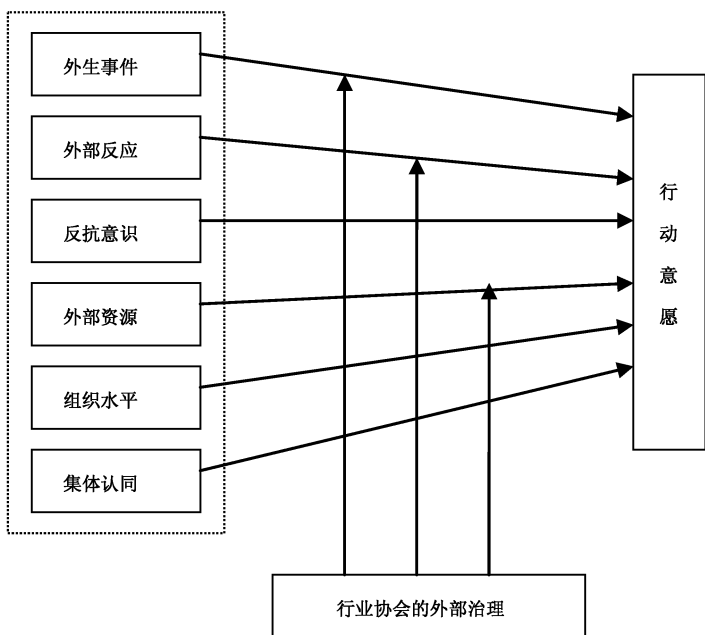


图 4 行业协会作用机理模型 III

很明显。而根据笔者对行业协会外部职能及国外关于行业协会集群治理的案头调研,发现行业协会对于提高会员企业的认知水平、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Warrend, 1992),对于提高会员企业与协会之间、会员企业之间相互信任水平也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在实证中未能得到数据支持,笔者的分析是由于我国现有行业协会发展不充分。现有的行业协会近 2/3 生存状态不佳,功能不全,更遑论协调会员的集体行动(余晖, 2001)。同时,协会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行政授权不足、经费困难、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行业代表性不强和职能发挥不充分等^①,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原本应有的作用和效应没能得到显现。

① 进一步阅读可参见崔艳丽(2005)、郑江淮(2006)等。

五、研究结论及不足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几个初步结论:第一,集群企业集体行动与包括外生事件在内的6个方面的因素关系显著。这些因素能够较好地解释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也可以运用这些影响因素对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意愿进行预测分析。第二,行业协会在各因素影响集群企业集体行动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其中强迫性大小、影响广度、外部反应、不公平性、可消除性、舆论支持、动员强度和相互依存等8个指标均受行业协会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功能的显著影响;而影响强度、事件传播和信息支持等3个指标则均受行业协会信息沟通功能影响比较显著;再次是经费支持、对组织者的信任、同质程度和对赏罚有效性的认可等4个指标则受行业协会的协调功能的影响显著。第三,行业协会在外生事件、外部反应及外部资源等三个因素上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而在其他因素上表现不明显。更为具体地讲,在外生事件的强迫性大小、影响广度和事件传播3个指标上有调节作用,在外部资源因素中的经费支持和信息支持两个指标表现出调节作用,尤其是经费支持指标,是所有指标中差异性最大的一个,也意味着是调节作用最强的。另外,还发现动员强度在会员企业与非会员之间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通过比较其他实证部分的结果发现,会员企业的动员主要与协会的信息支持关系密切,而非会员企业的动员则主要看重的是协会的协调功能。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提6个方面的集体行动影响因素会在每个集群企业中表现出个体差异性。因为每个集群企业所处的环境和状态是有差异的,肯定会存在除了行业协会之外的其他一些因素会对文章所提的6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产生作用,从而使其在个体上表现出差异性。因此,如果能进一步识别出除了行业协会之外的这些因素,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来分析行业协会的作用,相信效果会更好。另外,尽管已有许多学者在类似的研究中使用这一测量指标来进行相关的测度,但对于用行动意愿这样单一的指标作为集体行动的测量变量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测量不充分的缺陷。

参考文献:

曹建民等, 2005.《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 陈金罗, 1997,《社团立法和社团管理》,北京:法律出版社。
- 陈潭, 2003,《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中国软科学》第9期。
- 陈希敏, 2006,《经济落后地区农户金融合作意愿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第3期。
- 崔艳丽, 2005,《论我国行业协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郭东红、蒋文华, 2004《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基于对浙江省农户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 黄少卿、余晖, 2005《民间商会的集体行动机制——对温州烟具协会应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 贾西津、沈恒超、胡文安, 2004《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
- 黎东升、朱良俊、杨舟, 2006,《就业素质培训:农民参与意愿的实证分析》,《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期。
- 李红春, 2005,《反倾销应诉的集体行动研究》,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瑞涵、赵强, 2002,《合作理论及其稳定性分析》,《天津大学学报》第11期。
- 卢馨、顾建平, 2004,《知识员工薪酬激励调节变量》,《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骆璇、符正平, 2007,《产业集群中的行业协会——基于多边惩罚策略的第三方私人治理机制》,《中大管理研究》第2期。
- 宋养琰, 1995,《关于行业管理的几点思考》,《论工业行业管理新体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 吴宗祥, 2003,《行业协会治理机制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学会月刊》第7期。
- 徐国念、官建成, 2001,《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提高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0期。
- 许淑君、马士华, 2001,《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与社会制度》,《工业工程与管理》第5期。
- 杨穿明, 2006,《论新时期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发展》,《商业时代》第12期。
- 余晖, 2001,《行业协会:政府与企业的润滑剂》,《中国经济信息》第9期。
- 余晖等, 2002,《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理论与案例》,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 张亮, 2004,《行业协会发展模式的探讨》,《市场周刊》第4期。
- 张理泉, 1991,《工业行业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张勉、张德, 2006,《Price-Miller 离职模型中价值观变量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管理评论》第9期。
- 张亦宁, 2006,《异质性与反倾销应诉的集体行动研究》,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郑江淮, 2006,《行业协会职能配置与政策创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论文库收录, <http://www.usc.cuhk.edu.hk/wkqb.asp>
- 郑小勇, 2007,《集群内企业的竞合:回顾与展望》,《经济纵横》第16期。
- Aaron Kingsbury & Roger Hayter 2006,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Local Development: The Okanagan Wine Industry's Response of NAFTA." *Geoforum* 37.
- Baron Reuben M. & David A. Kenny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 Bradley, Joseph F. 1965, *The Role of Trade Association and Professional Business Societies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De Langen, Peter 2004 “Governance in Seaport Clusters.” *Maritime Economics & Logistics* 6 (June).
- James L. R. & J. M. Brett 1984 “Mediators, Moderators and Tests for Medi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9.
- Jenkins, J. C. & C. Penrow 1977,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Farm Worker Movements (1946—197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2).
- Klandermans, B. 1997,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Lamb George P. & Camington Shield (eds.) 1971, *Trade Association Law and Practice*.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 McAdam, D.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advi, K. 1999 *Facing the New Competition: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y Industrial Clusters*. Discussion Paper,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Labour Studies.
- Snow, D., E. B. Rochford, Jr., S. K. Worden & R.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 Tilly, C. et al.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London: Dent.
- Waarden, Frans Van 1992,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Interest Associations: An Example from the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Studies*, Fall.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张志敏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of selective mobility of workers from the state sector to the market sector to illustrate how the market transition has led to earnings inequality in former state socialist countries.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2000 from ten Chinese cities reveals that recent entrants into the market are driven by two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resulting in a more heterogeneous body of workers in the market sector than befor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monly observed higher earnings in the market sector are limited only to a subgroup of later entrants who enter the sector voluntarily.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es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 of a late market entry on earnings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pensity of making such a transition.

Worker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Times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Wu Qingjun* 58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worker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 on the base of a case study. With the defini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which Michael Mann defined, the article respectively interprets the process and the cause of workers' collective interest consciousness, and factors and process which form worker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worker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OE are formed outside of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opposition is no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lso, the cause of opposition is not the rigorous discipline in the factory, b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ystems and the corruption of supervisors. It is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s of workers in SOE that promotes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Village Democracy and Its Determina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400 villages *Sun Xiulin* 80

Abstract Thirty years pas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democracy, but there is still a critical puzzle: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village democracy in China? Using a representatively nation-wide sampl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 including economic factors,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political factor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e: (1) economic factor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village democracy. (2) Local institution, especially the existence of lineage organization, has an essential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A harmonious community is also helpful. (3)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factor is not proved in this paper.

The Mechanism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Impact on Exterior-event Oriented

Abstract The functioning mechanism of industry association to exterior-event oriented collective action of clustered enterprises is to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will of collective action by outer governanc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 Exterior event oriented collective action of clustered enterprises is due to the exterior event, exterior reaction, sense of resistance, exterior resources, organization level and collective cognition. In the meanwhile, industry association can obviously adjust the impact of the exterior event, exterior reaction, exterior resources and intensity of mobilization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clustered enterprises.

How Gray Power is Possible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Society of Senior Citizens in Zhejiang province
..... Deng Yanhua & Ruan Hengfu 131

Abstract The paper explains why the Society of Senior Citizens (SSC) has achieved relative high level of autonomy and capacity in rural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selective management over NGOs unexpectedly provides autonomy for SSC's development. The capacity of bloc incorporation entitles SSC to higher authority in village community and contributes to its mobilization ability in collective actions. Local governments can change their intention of management easily and try to constrain SSC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but the regulation could not work effectively in a short time because of the resilience of SSC's bloc incorporation function, especially when rural welfare delivering model remains unchanged.

Historical Sociology Analysis on the "Clan-dynasty" Relationship: With additional discussion on macro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Shen Yi 155

Abstract The *clan-dynasty* relationship is the nucleus of macro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The ethic design for *clan* and *dynasty* is *translating filial piety to loyalty*, while it can't clear up the latent tension of *replacing dynasty with clan*. With the comprehensive estab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synchronous constitution with *clan* and *dynasty* by the connection with gentry power and imperial power finally realized. However, behind the ethic form of *translating filial piety to loyalty*, it is the benefit-share mechanism in which gentry power really depends on imperial power. Furthermore, the average allocation system of household heritage among all sons by *clan* and the lineal primogeniture system by *dynasty* seem to be inconsistent, but are substantially helpful in strengthening the imperial power, which implies cultural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Outside and Legalism Inside".